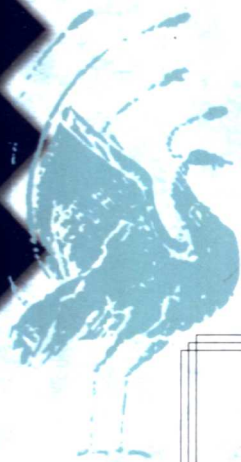


傅修延
著

先秦叙事研究

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曹春

版式设计:任宗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傅修延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2

ISBN 7-5060-1255-3

I. 先

II. 傅

III. 古典文学-叙述-文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I206.2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

XIANQIN XUSHI YANJIU: GUANYU ZHONGGUO

XUSHI CHUANTONG DE XINGCHENG

傅修延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46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 7-5060-1255-3/Z·106 定价:19.00元

序

傅修延先生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即将付梓出版,要我写几句话冠于书前。我和他相识多年,深知他在中国叙事学学科建设上的雄心壮志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他在这方面取得的累累成果而欢欣鼓舞,所以明知他的新著本应由更权威的人来做序,最后还是不自量力地答应了。

说到叙事,这本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在社会交往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一个人,只要具备语言能力,也就是会说话,就一定会叙事,也免不了要叙事。也就是说,叙事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学会了的,同时也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需要。即使失去了语言能力,我们也一定能找到别的工具来作为叙事的媒介。总之,叙事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然而,恕我孤陋寡闻,也许正因为对叙事已习惯成自然,已熟视无睹,所以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对它加以系统研究的,似乎还不多。

在中国文化里,叙事传统是悠久而深厚的。傅修延的研究指出,最初是口舌言事传事,而至迟从“结绳而治”“刻木为契”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试用话语以外的手段来叙事记事,使之能够传达并付诸记忆与保存了。再往后,文字发明了。“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

书·序》)而与图画关系密切的文字,“完全是按叙事要求来构形的,它是一种为叙事而诞生的文字,在表事方面它比世界上任何主要文字都来得直接。”文字是叙事的有力工具,有了它,叙事就走上更迅速健康的发展道路。于是,便有了甲骨问事、青铜铭事,和以后史地书和诸子书的记事。从《山海经》、《尚书》到《春秋》、《左传》再到诸子百家,在中国古代,叙事行为不能说起源不早,叙事现象不能说不纷繁多姿。如果按照时代数下来,那么,杰出的叙事作品,有文学的,有史学的,有文史相兼的,也不可谓不多。

但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却远远跟不上叙事行为的实际发展。在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叙事学传入我国,才提醒了我们,从此在学术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近二十年来,叙事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喜人的。起初是翻译介绍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其中包括罗兰·巴特、托多罗夫和日奈特诸名家的有关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了《当代叙事学》。与此同时,我们的小说研究和评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无论是对古典小说,还是对现当代小说,研究者都试图贯穿以叙事学理论,或借叙事学的观念予以审视,出现了不少富于新见的力作。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得风气之先,视角新颖,规模粗具。本人也以《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踵其后武。近年来,随着文体学研究的发展,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叙事学专著,如收在《文体学丛书》里的《叙事学导论》(作者罗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8)等。此外还有不少专著与论文,难以一一列举。叙事学研究领域可谓一片繁荣。

在建设中国自己的叙事体系的事业中,傅修延是非常积极、成绩突出的一个。他有很好的国学根柢,又有专业的外语水平,曾到国外求学,师从过加拿大著名文艺理论家诺思罗普·弗莱,又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拿下了文学博士学位。自1990年以来,他发表了数十篇叙事学论文和一本专著《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形成了一个主题鲜明的系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其中发表于《文艺争鸣》上的论文《中国叙述学开篇:四部古典小说新论》,在该杂志主办的首届“文艺争鸣奖”评选中还光荣获奖。几位评委一致认为本文“具有开拓性和较强的学术性。它对探讨中国小说的独特的叙事形式和语言特征,参照西方叙事学的成就,逐渐形成有关中国小说叙事的理论假说,具有非常的意义。”《讲故事的奥秘》一书也得到了江西省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是修延先生的一部新作,也是一部力作,显示了他的研究正朝着更扎实、更深入的方向前进。我有幸先读为快,受到的启发良多。我觉得这本书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优点。

一是作者所持的叙事概念是广义的,他将一切“有秩序的记述”行为,均视作叙事。因此,本书论述对象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尤不限于小说),而是“雅俗一体”“史稗无分”“韵散同举”“三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连锁”,这就不但大大扩展了视野和取证范围,而且有利于对叙事行为作追根究底的研究。迄今为止大多数的叙事学论著,都以小说为主要对象。这是因为小说确实是人类叙事智慧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类通过一代代的叙事实践所培育的最具典型意义的成果,小说最能也最便于成为叙事学的用武之地。可是,叙事行为却不仅仅表现于小说,要想全面深入地研究叙事行为,将范围仅限于小说又是不够的。傅修延的突破,对于开拓叙事学的天地,具有重大意义。

二是全书逻辑谨严地检视和叙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过程,从初民对叙事工具的探寻讲起,依次论析了甲骨文、金文、《易经》、《诗经》、《山海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战国诸子和散文中的寓言等在叙事学上的价值和各自的特色,从而令人信服地得出了“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结论。尤其可贵的是,本书有意识地注意和突出民间口传文艺在叙事传统中的作用,为前此众多有成就的叙事学著作所不及。

三是本书的论析善于抓住各对象的特点,紧扣“叙事”这个主题,而又不拘泥局促,在翔实资料的支持下,随处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论点,如三章二节“青铜铭事”对铭文的叙事特色及其在叙事史上意义的论述,以及历史性叙事、戏剧性叙事等概念的提出;如四章三节“诗经感事”中“史诗问题纵横谈”对《诗经》所含史诗的多层次分析;如五章四节对《左传》叙事特色及其影响的论析,等等,均十分细致而精彩。

看得出来,这部书是傅修延潜心读书、严密思考并精心结撰的结果。如果我说这标志着他的叙事学研究攀登上了一级新台阶,也预示着他的研究有非常广阔的前景,应该不会被认为是溢美吧。

是的,每一本扎实有力的论著都是向学科体系的峰巅挺进的重要一步,但登上顶峰的路途还是遥远而艰难的。

在我看来,叙事学体系的建立,还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着重考虑。或者说,叙事学研究还有好几个可供选择的突破点。借此机会不揣冒昧地提出来,既供修延先生参考,也想与之切磋,并愿向读者和同行们请教。

其一是叙事学研究需要加强心理学方向的工作,即将心理学引进叙事学研究,将叙事作为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和机制看待,研究叙事与人心理活动的关系;

其二与此相关,是从叙事能力成长史的角度,研究这种能力的

本质和叙事的规律。也就是说,叙事学研究不但需要一般心理学,而且需要儿童心理学的介入。事实上,一个人从孩童的简单叙事到成人的复杂叙事、虚拟叙事,从学写纪实短文到学会虚构地创作小说戏剧,并使之达到可以乱真的“第二自然”的程度,要经历漫长的道路,而这个过程就颇像人类叙事能力成长史的缩影。

其三可谓文体学方向,即研究不同文学文体所需要和所能容纳的叙事性,因为诗、散文、小说、戏剧(包括影视),都与叙事有关,而在叙事的要求和可能上,又有很大的不同,而在这种种不同的内部,实含着某种层次性和递进关系。这是需要研究清楚的。

其四是研究非文学文体的叙事性。所谓非文学文体,如史学、哲学和一般应用文体(从新闻报道、通讯直到各类广告),叙事因素在这些非文学文体的作用不可低估。这是中国叙事学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五是建设以中国历代代表性叙事作品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历史叙事学。我以为,修延先生目前的这本书即属此范围,他已经开了一个好头。

其六是中外比较叙事学,其内容、价值和重要性不说自明。

如果我的设想不是毫无道理,那么,与之相比,目前的叙事学研究显然还是很不够的,因为还只是小说叙事学比较兴盛,其余的研究方向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要填补的空白,真是不少。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叙事学研究大有前途,瞻念前程,确实任重而道远,而研究的乐趣和可望的收获,又是那样诱人。

傅修延先生的这本书对“先秦叙事”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其所昭示的方法是可取的。问题是中国的历史很长,要把叙事史做完整,就需要从先秦开始一代一代地做下去,一直做到当代。这项工程规模很大,难度不小,但修延先生既已开了头,我想他不会半途而废,一定会锲而不舍、踏踏实实地做下去。他有充足的学术准

备,又有刻苦奋斗的精神,现在他所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又有很好的学术环境,我相信,只要积以时日,是一定能够把这项工程完成的。我诚挚地祝他成功。

是为序。

董乃斌

1999.4.10

内 容 提 要

先秦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古代文明基本上是在中国区域内独自发生与成长起来的。形成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叙事传统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背景决定了它应有与其他叙事传统不同的一些规律与特点。万变不离其宗,只有深刻懂得我们自身的叙事传统,才能更好地认识并把握后世叙事的发展与流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本书致力于研究先秦时期诉诸于各种传播媒介的叙事形态,通过寻找叙事行为发生、成长与壮大的痕迹,以及观察传世典籍的贡献与影响,达到揭示中国叙事传统的规律与特点并勾勒其基本轮廓的目的。叙事发轫于上古。先秦时期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处于“共生”状态,带有叙事意味的信息传递行为五花八门,散见于甲骨青铜、卦爻歌辞、神话史传、诸子言论、民间文艺与宗教祭祀等多个方面。“含事”材料的融通汇聚,叙事形态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为了全面准确地描述它的面貌,合理反映各类事物在传统形成中的作用,本书设计了以传播形态为线索的论述框架,以便细致讨论各种叙事形态的条件、功能与贡献。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介绍本书的专业背景与所处的学术前沿,以及这项工作的意义与使用的方法。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为本

书的主体,讨论对象为叙事的工具、载体与形态等,其具体内容如下:

第二章,主要讨论先民对叙事工具的探寻。结绳、刻契和图画等古老的记事方式在保存、传递事件信息等方面存在不足,惟有与人类语言对应的文字,才是准确、经济并能独立自足地说明事物的最佳记事符号。文字叙事的目的是在读者心目中唤起事物在时空中连续运动变化的形象思维,以形表意的汉字为读者将携带事件信息的符号转换还原为栩栩如生的事件图像,提供了表音文字不可企及的极大便利。这些便利表现为:一、汉字的构形与叙事要求高度契合;二、汉字的组合易于激发动态联想;三、汉字在表意时往往伴之以关于事物状态之类的额外信息。因此,汉字不仅以其组织起来的文句叙事,它的每一个字也往往参预进叙事。

第三章的对象为叙事的各类物质载体,其中用两节篇幅分别讨论甲骨问事与青铜铭事这两类特殊的叙事形态。甲骨问事是最古老的文字叙事,它在中国叙事史上的意义表现为:一、作为一种以神明为受述者的文字通讯,它赋予叙事高度的严肃性乃至神圣性,奠定了记事之笔外关神明内系良知的基本观念。二、创立了一种能够容纳叙事诸要素的文字组织形式,为书面形态的叙事提供了发展基础。三、带来了一种简练经济的叙事风格。四、开启了一种从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此外,在卜辞中已经出现了早期叙事中记言与记事分列、记言色彩较浓的特征。与甲骨问事相比,青铜铭事在五个方面有了进步:一、西周铭文的叙事性大为增强,在铭文中出现了正式的叙事文体。二、铭文扩大了叙事的规模,提供了比卜辞更多的事件信息。三、铭文中虚构性因素隐约出现,韵语粉墨登场,文学性叙事开始萌芽。四、铭文中叙事要素逐渐告别朦胧,对时间与空间的表述趋于规范,对事件过程的叙述有所增多,人物的面目也开始清晰。五、铭文中记言艺术有突出的发展,

重视记言的趋势进一步明显。

第四章讨论主要诉诸于声音信号的口舌传事。第一节认为,《易经》卦爻辞韵语中隐藏着一批初民歌谣,民间营养的浸润使得其中出现生动活泼的意象,最初的隐事和喻事本来是为筮占服务的,但后世诗文中意象的积极运用则创造了含蓄闪烁、摇曳多姿的文学效果,《易经》作为“群经之首”的地位,对隐喻性叙事进入传统起了重要作用。第二节首先讨论东周的民间谣谚,它们既与原始歌谣相似,又显示了一定的历史进步。第二节还讨论了上层阶级对诗歌的引征,其中赋诗言志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诗歌消费,是古代礼乐与揖让文明的具体象征,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人际交往行为,以诗代言并从中断章取义构成了一套微妙复杂的表意手段,将口头传播的隐喻性叙事提升到了高度艺术化的境地。第三节用较多篇幅讨论《诗经》,在文字传播远未普及的《诗经》时代,民间传唱是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在这条渠道中流通着当时人们普遍关心并乐于传播的各种事件信息,统治阶级亦从政治角度对这种叙事形态给予高度关注。

第五章着重研究史家之文。第一节将《山海经》的功能确定为图注,认为其与“纪事之词大异”的“依图而述”方式是一种静态叙述。静态叙述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诗骚两经中都有其同类,这说明先秦时代文字与图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静态叙述并不影响《山海经》为后世叙事文学提供题材与故事胚胎,《山海经》中体现的神话思维,亦顽强地穿透各种文体的壁垒放射出影响。第二节认为《尚书》的初始形态应与上古诵志型的记言方式有联系,“以言治政”时期的统治作风,使《尚书》的语言风格出现“直陈”、“动情”、“用威”、“繁琐”等特征。《金縢》中事实与虚构的冲突,代表着文学性叙事在史传母体中的躁动。第三节将《春秋》视为具有法典意义的史著,《春秋》中体现的三项原则——叙事须依

时序而行、文字要多加锤炼推敲以臻精练、作者应依据思想道德原则对所述事物作不动声色的颂扬与挾伐,化为后世弥漫在叙事领域内的集体无意识。然而《春秋》自身也存在着立法而不尽遵法,信史而未可尽信,记事而事欠详明等问题。第四节用较多篇幅讨论《左传》。《左传》之所以成为先秦叙事史上的高峰,关键在于其中实现了记言与记事的均衡合宜、文本与故事的基本对称以及事实与虚构的交融互渗。但《左传》内部仍蕴伏着叙事主体与编年史体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对未来叙事进程的强力呼唤。从《左传》的“依时而述”、《国语》的“依地而述”到《世本》的“依人而述”,显示出一种蹒跚而又执著的历史进步,说明先秦时代就已萌发了全方位记述史实的伟大思想,并且摸索到了纪传体这种囊括力极强的、后来为“二十六史”一以贯之的史传体制。

第六章讨论诸子之文。第一节认为《战国策》所记之言具有巨大的雄辩性与说服力,就言语交际角度看攀上了先秦时代的最高峰。诸子善于设譬用喻,论道说理之中往往显露出夫子真容。《庄子》记言达到高度成熟,庄子的人物语言比别人更少道学气,更加性格化和具象化,并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反讽语调,在整体倾向上偏于严肃的先秦时代独树一帜。《庄子》记言的最高成就体现于《盗跖》,这篇颇为规范的对话体小说即使与后世名篇相比也不遑多让。第二节谈到寓言故事在诸子之文中蔚为大国,寓言生于譬喻,先秦隐喻性叙事传统中早就种下了寓言发育的胚胎,诸子之文中保留着譬喻向寓言过渡的残痕。诸子寓言为经过千锤百炼的微型故事,它们进一步压缩为四字代码的成语后扩大了汉语的表现力,汉语的单字与词组同时都在激发关于行动与故事的联想。《说林》、《储说》与《吕氏春秋》等“故事库”将寓言集腋成裘组成方阵,它们为后人保存了包罗万象的丰富故事,反映出古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宏伟追求。寓言的虚构性为小说的发育之因,庄子擅

长的虚构性叙事是先秦文学的亮点。第三节提出,子书中经常出现的韵语,反映了以声音传播为主要途径的大众文艺传播对诸子之文的影响与渗透。《荀子·成相》摹仿了当时民间文艺中一种业已定型的说唱样式,为其伴奏的“相”是一种颇富中国特色的打击乐器,这种说唱与伴奏方式源于古人遇事抒怀时击物“节歌”的习惯传统。荀况保存并提升的说唱样式为曲艺之祖,是后世戏剧与小说的渊源所在。第三节最后讨论与民间文艺关系更为密切的屈原,认为民间文艺中“仪式性”的滋润,有益于屈原在赋事手段上的开拓与多角度多侧面地塑造人物,楚地巫风亦使他笔下之神充满“人情味”与泥土芬芳。

第七章为本书的结论——中国叙事传统形成于先秦时期。这个结论实际上是由本书主体各章节中一系列观点汇聚而成的,它们可以归纳梳理为支持结论的四点认识:一、在先秦叙事中,叙事诸要素由朦胧走向清晰,对叙事行为的驾驭逐渐成熟,其中记言能力的迅速成长尤为突出。二、先秦叙事已经表现出相当清醒的自觉,作者的主体意识亦有所抬头,这些促进了对叙事形式的讲究,导致叙事中虚构成分增多,为历史性叙事与文学性叙事分道扬镳各领风骚作好了准备。三、先秦叙事在中华民族叙事思维上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其形态、倾向与特征对后世叙事发生了深刻影响。四、先秦叙事处于中国叙事史上的拓荒阶段,它播下的许多种子为后世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生长点,它建立的一系列范型亦获得绵延不绝的发扬光大。

STUDIES ON PRE – QIN NARRATIVE:
THE FORMALIZ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BSTRACT)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originates from and takes shape in pre – Qin perio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basically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grows up independently within Chinese region. Since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formalized in pre-Qin tim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macro-background determines it must have regularities and traits different from other narrative tradition. All change comes from origination, only by clearly commanding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ourselves, we could understand later narrative development better. Guiding by this thought, the author concentrates on studying the various narrative patterns in order to reveal law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and draws a broad outline of it.

Narration originates from pre-history. In pre-Qin time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narrative mix up together, narrative message transmitting is multi-furiously scattered in fields of inscription on bones, tortoise shells and bronze wares, divinatory verses, myth, books of history, speeches of Zhu

Zi (the exponen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pre-Qin times), folk art and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acrificial rites. The formalization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is greatly benefited in the melting process of miscellaneous narrative morphologies. In order to have a comparatively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description about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the author focuses each narrative message carriers in turn so that we could fully elaborate their condition, function and contribution. Considering pre-Qin narrative has comparatively more primitive elements, this study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verbal and folk narrative forms. The followings are the key questions of focalization: How does the event-recording act appear? How does the narrative expression develop from unconscious to conscious? How many stages has the tool and media exploration undergone? When does the fictional element show up in narration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become complicated? In the meantime of follow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lso pays attention to analyse each narrative morphology bringing to light their effect, contribution and significance in narrative history.

The book consists of seven chapters. "Postscript" states the academic intention and emotional tendency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Chapter One introduces this project'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cademic front position, methods and significance. Chapter Two to Chapter Six is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is book dealing with narrative tools, carriers and patterns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s:

Chapter Two mounts a probe of narrative tools. Tying knots, carving and writing pictures, the earliest recording methods, have short comings in narrative information's 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nly the written words corresponding human language is the most efficient narrative symbol

that could relate things accurately, economically and independently. Literal narration produces an impression in reader's mind about thing's continuous change and movement in time and space while ideographic Chinese character has unique advantages in converting narrative information into picturesque impression. Those advantages are due to the followings: Chinese character meets the narrative demands harmoniously;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parts could stimulate reader's imagination for fictional motion easily; Chinese character occasionally provides extra information about the acting subject. When one narrates in Chinese, he is not merely using the sentences and words, the characters are also joining in his narration! The marvelous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 even bring inspiration to some foreign artists and help them remould their arts thoroughly.

Chapter Three discusses material narrative carriers such as inscription on bones, tortoise shells and bronze wares. The earliest Chinese written narrative is inscription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its narrative significance might be put like this: Firstly, as a written communication to the god, it entrusts narrative the endowment of earnestness and holiness and set up a basic concept that the narrative writing is linked with upper gods and inner consciousness. Secondly, it founds a composition pattern containing all the basic narrative factors that provides a developing foundation for narrative in written forms. Thirdly, it helps to bring up a succinct narrative style. Fourthly, it initiates a narrative formula beginning with question and answer. Comparing with bone or tortoise shell inscription, bronze ware inscription advances in five fields. A. Western-Zhou bronze ware inscription has more narrative components, some inscription could be taken as formal narrative composition. B. The bronze ware in-

scription extends narrative range concluding far more historic event message than inscription on bones or tortoise. C. The emerging of fictional elements and rhyming words indicates that literary narrative is on an embryonic stage. D. The narrative factors become more and more clearly: expression for time and space turn normal; action process description is enlarged and the appearance of characters start to be distinct. D. Speech recording art develops conspicuously fast, showing that tendency toward speech narrating gets more prominent.

Chapter Four focalizes on verbal narrative relying on the transmission of sound signal. Verbal narrative is the most important narrative activities in pre-Qin times and often serves as the original sources and foundation for other narratives. To avoid message deterioration and deform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use music, rhyming and matching words as memory supplement. Section One studies Yi 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In Yi Jing there are many initial rhyming imaginative verses preserved by the methods mentioned above. Originally early metaphors and images only serves divination, but gradually the active application of them creates implicit meaningful literary effects. Section Two discusses Eastern-Zhou folk ballads at first. Having similarities with initial rhymes, Eastern-Zhou folk ballads displays the following historical progress: the folk traits such as hinting, mocking and joking get stable; the method that adding a few words to clinch the point (concentrating on painting the dragon's eye) is used more skillful; and the metaphorical arts, such as "bi" (comparing) and "xing" (introducing and comparing) emerge in folk ballads. Section Two then analyses the common quotation atmosphere in Eastern-Zhou society. "Fu Shi Yan Zhi" (quoting popular poems to hint one's intention), the prevalent social fashion and important kind of poetic consump-